

从对音材料看汉语西北方言元音高化的历史层次*

胡 鸿 雁

[提要] 本文尝试根据民族语和汉语对音材料指出汉语西北方言历史上曾经历与鼻音韵尾脱落有关的三次元音高化。现代晋语和兰银官话各方言点的阳声韵分别表现为鼻音韵尾、鼻化元音和元音韵尾三种类型，相应元音的舌位也高低有异。这类复杂现象是不同历史层次叠加造成的结果，并非语言本身的直接发展。西北方言相关的历史演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产生于8-11世纪，特点是鼻音韵尾-n的脱落和元音的高化，即 $a > \varepsilon > e > i$ 和 $a > \circ > o$ ；第二个层次产生于11-13世纪，特点是鼻音韵尾-n的脱落和元音的高化，即 $a > \varepsilon > e$ ；第三个层次产生于13世纪中叶以后，特点是此前已经脱落的鼻音韵尾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又添加上去，随后在一部分方言点重新开始了元音高化的过程。元音高化的起因可能与鼻音韵尾的脱落有关，但两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同步。

[关键词] 对音 晋语 兰银官话 鼻音韵尾 元音高化

一 引 言

本文所说的“西北”指的是甘肃河西走廊沿线经宁夏至内蒙古包头的那片地域，当地汉语方言大致属于兰银官话和晋语区大包片（乔全生 2008:39），但其内部特征差别较大。古丝绸之路是诸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除汉族外，还有粟特、吐蕃、回鹘、党项和蒙古等诸群体也曾先后活跃在那里。少数民族诸群体中有些人会说汉语，但在其母语制约下难免出现音值乃至音位的偏移，有些偏移也会反过来影响汉语（孙伯君 2016）。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记录的汉字音借助文献保存至今，虽经反复研究，仍造成学者们理解上的困惑。尤其是在梳理其古今演变过程时，学者们很难判断哪些情况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主线，哪些情况是在周边民族语言或者元明官话影响下产生的变异。如现代晋语和兰银官话各片区方言点的阳声韵分别有鼻音韵尾、鼻化元音和元音韵尾三种类型，会使研究者们轻易想到 $an > \tilde{a} > a$ 这样的演变路径，可这却与古文献显示的情况相悖。

本文尝试基于对音文献材料指出汉语西北方言在历史上经历过与鼻韵尾脱落有关的三次元音高化，以期能成为解释西北方言史的依据。毋庸讳言，无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基于汉语通语与方言研究的番汉对音数据库建设（20VJXT016）”资助。本文得到聂鸿音先生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文中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其本身都不能精确表现汉语的某些音韵细节，使得不同来源的书面信息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直接演变序列，但我们认为，如果聚焦于中古汉语梗宕山咸几个韵摄的元音高化规律，从盛唐长安话到后来西北方言的大体发展趋势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本文研究所依托的主要材料如下：

第一，梵汉对音材料。此前的研究表明，8世纪的长安话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汉语方言之一，可以看作现代晋语乃至古丝绸之路沿线许多汉语土语的始祖。其最丰富的早期材料是不空（705-774）一派经师翻译的佛教密宗咒语。马伯乐（Maspéro 1920；马伯乐 2005）选取其中的梵汉对音为佐证，讨论了《切韵》音系到盛唐长安话百年间的音变。刘广和（2002:1-118）详细整理并分析了不空的全部对音资料。前贤的工作成果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第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音材料。除梵汉对音外，还有几种书面材料的时代大致前后相接，可以用作其后数百年间汉字读音的佐证，其中主要包括：①敦煌所出汉藏对音文献（罗常培 2012；高田时雄 1988），特别是韵母变化较大的《千字文》，其时间约在9-10世纪；②回鹘文译本《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里的对音字例（聂鸿音 1998），其时间约在11世纪；③党项人所编小学著作和所译中原汉文著作中的对音字例，特别是用作语言教材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景永时、I. F. 波波娃 2018），其时间在12世纪下半叶。

第三，近现代汉语西北方言的调查记录材料。高本汉（2003）提供的“方言字汇”是一个多世纪前的珍贵资料^①，受通用语的影响较小，且给出了系统音韵信息，因此，本文近现代西北方言资料多依据高本汉（2003）。

二 梗摄元音的高化：9至12世纪

不空翻译的佛经咒语表明8世纪长安话的梗摄三四等阳声字一律不带鼻音韵尾，只是其主元音在e与i之间换用不定（刘广和 1991）。在其后的几种译音文献中，仅西夏鲜卑宝源汉译佛经咒语与不空译音类似，存在由梵语轻重读造成的e、i混用现象，其他资料都显得颇为整齐。例如汉藏对音《千字文》（罗常培 2012:64、65）^②：

二等：烹 *phe*^③，笙 *she*

三等：兵 *pe*，京 *ke*，英 'e；横 *hwe'e*；秉 *pye*；情 *dze*，纓 'e；精 *tsye*，轻 *khye*，
并 *pye*；倾 *khwe*，营 'we

四等：铭 *me*，庭 *de*，宁 *ne*，聆 *lye*，星 *sye*，刑 *hye*

再如回鹘文译本《大唐三藏法师传》（聂鸿音 1998）：

二等：庚 *qi*，行 *xi*

三等：明 *mi*，敬 *ki*；静 *tsi*，贞郑 *ci*

四等：丁 *ti*，灵龄 *li*，经 *ki*

粟特文音译的“天干”里也有三个梗摄字（Müller 1907），后来有关音韵学著作多次征引：

^① 清代至民国初年有些著作集中记载了西北的汉语方言词语，如张澍（1781-1847）的《秦音》以及各种地方志的“方言”部分，但因这些资料没能提供系统的音韵信息，本文没有采用。

^② 转写形式有些未遵从原书，而是使用了现在较为通行的转写形式，主要的不同如下：送气符号“‘”改用h，零声母符号“•”（∅）改用“'”，ç改用sh。

^③ 文中拉丁转写形式用斜体表示，以区别于语音形式。

二等：庚 *qēy*

三等：丙 *pīy*

四等：丁 *tīy*

12世纪中叶鲜卑宝源的汉译佛经咒语里有以下例字（孙伯君 2010:100）：

三等：唵 *bhe/bhi*；呤 *rai/re*；永 *ve*

四等：铭 *me*，丁 *te*，叮 *te/ti*，宁 *dai/de/dhe/dhi*，形 *he*

汉藏对音《千字文》里另有一部分梗摄字保留着鼻音韵尾（罗常培 2012:88），看来藏文译者在个别字的鼻音韵尾有无之间把握不定。这就是说，汉语西北方言梗摄字的脱落经历了约百年时间，直到11世纪才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的方言土语中全部完成。

汉译佛经咒语里不出现梗摄二等字，表明梗摄二等的主元音与梵文“婆罗门十四音”里的任何一个都不相当，也就是说，它不会是 *a*，也不会是 *e*。回鹘文译音作 *i*，粟特文译音作 *e*^①，暗示它比三四等 *i* 的舌位略低，这自然会使研究者想到那应该是位于 *a* 和 *e* 之间的某个元音。这个音可以在西夏党项人对汉字的音译中得到启示和线索。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例子：

𦉑 = 棚 (22.1; *b'ɛŋ) ^②	稗 (16.1; *b'ai)
𦉑 = 铛 (23.4; *tɕ'ɛŋ)	豺 (16.5; *dz'ai)
𦉑 = 庚 (9.6; *kɛŋ)	皆 (27.2; *kai)
𦉑 = 杏 (14.1; *xɛŋ)	鞋 (25.2; *xai)

梗摄二等字和蟹摄二等字用同一个西夏字对译，说明其读音一样，但这个音不可能是像蟹摄那样的 **ai*，因为蟹摄二等字在佛经里从不用来对译梵文的元音 *ai*^③。排除了 *ai* 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大体判断这个元音是 *ɛ*，它位于 *a* 和 *e* 之间，可以解释为中古蟹摄二等 (**ai*) 单元音化的结果，情况与今甘肃酒泉、敦煌等地的读音相同（张盛裕 1993）。

梗摄三等字和四等字在一些文献的对音里并不严格区分，如回鹘文和粟特文都译作 *i/ī*，是因为这两种文字系统中没有表示 *e* 的专用字母。从汉语的角度来看，可以根据等韵学上“三四皆细，而四尤细”的说法，判断梗摄三等是 *e*，四等是 *i*。

把以上结论与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对照，可以看出梗摄的以下演变模式：

二等：**ɛ > ɛ*

三等：**ɛ > e*

四等：**e > i*

演变的结果在宋代的汉文文献里也有记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即“青”**ts'ieŋ > “萋” *ts'i*，“经”**kieŋ > “稽” *ki*。这样的读法直至清代还可见（乔全生 2008:203-204），最终成了当代晋语里普遍存在的形式。

^① 回鹘文和粟特文的字母形体本身不区分 *i* 和 *ī*，拉丁转写习惯上参照前面的辅音字母而定，小舌辅音后面的这个字母转写作 *i*，实际读音比 *i* 略后略低，在现代维吾尔语口语里甚至可以读作 *ə*。

^② 括号里的数字是《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对音所在的叶次和行次，附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以便比较。下同。

^③ 梵文的元音 *ai* 早期一般用三等字“鞞”“吠”等对译，如用“鞞头梨”或“吠琉璃”音译梵文 *vaidūrya*（远山宝）；西夏时期改用一等字“味”，如用“味娘搽捺”音译藏文 *bairotsana*（< 梵文 *Vairocana*，大日如来）（孙伯君 2010:52）。

三 宕摄和江摄元音的高化：9 至 12 世纪

不空翻译佛经咒语时不用江摄字，宕摄阳声字则使用频繁。除去个别例外，宕摄鼻音声母字都不带鼻音韵尾（刘广和 1991），如以“囊”译 *na*，以“莽”译 *ma*，等等，可以看作中古汉语鼻音韵尾脱落的开端。到了晚唐五代的时候，这种演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汉藏对音《千字文》表明，宕摄脱落鼻音韵尾已不限于鼻音声母字，主元音也从 *a* 变成了 *o*（罗常培 2012:58、59）：

一等：傍 *bo*，邛 *mo*，囊 *no*，抗 *kho*；煌 *ho*，旷 *kho*

三等：床 *cho*，肠 *jo*，觞尝赏 *sho*，颍 *so*，唱 *cho'o*；粮两 *lyo*，墙 *dzyo*，厢 *syo*，象 *syo'o*，将 *tsyō*，相 *syō*；纺 *pho'o*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回鹘文译本《大唐三藏法师传》（聂鸿音 1998）。虽然年代稍晚，但对音不太整齐，显得其演变速度要比汉藏对音慢些：

一等：汤唐 *to*，藏奘 *tso*，纲 *qa*；光 *qo*

三等：祥 *siu*，张 *čuu*，长 *čuu/čañ*，昌 *čo*，尚 *šo*，阳 *yu*；昉 *vu*，王 *van*

显示这个演变全部完成的是 12 世纪的西夏文献（龚煌城 1989），那时已经全然不见宕摄字与梵文 *-ñ* 音节对应的情况。以下例子来自鲜卑宝源的汉译佛经咒语（孙伯君 2010:100），其中存在由梵语轻重读造成的 *o*、*u* 混用现象：

一等：光 *ko*，暇 *ro*，当 *tu*

三等：商 *šo/śu*

《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也有同样的例证：

𪛗 = 棠（13.4；*d'añ） 𪛗（16.3，*d'a）

𪛗 = 囊（26.4；*nañ） 那（18.6；*na）

𪛗 = 狼（16.4；*lañ） 罗（6.5；*la）

藏文和回鹘文都有专门表示 *a* 的字母，可是这里却用了 *o*，而基本没用盛唐传统的 *a*，表明这个元音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想见，如果像《番汉合时掌中珠》那样，宕摄一等（*añ）和果摄一等（*a）的读音相同，而且其韵母还不能是 *a*，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 *o* 了。藏文和回鹘文都没有专门表示 *o* 的字母，所以在译音时借用 *o* 来替代。

回鹘文字母对 *o* 和 *u* 并不作严格区分，而这两个音的藏文元音写法差别明显，那么在这里无疑就应该遵从藏文，把宕摄三等的元音设定为 *o*，同时假定这个 *o* 是在前面三等介音 *-i-* 的影响下从 *o* 变高的。

由宕摄三等可以联系到江摄。藏文注音文献表明江摄“绛”“降”“幢”等字的韵母是 *añ*，对音与当时还保留着鼻音韵尾的那些宕摄字一样（罗常培 2012:79）。如果承认合并后的宕江二摄此后发生了同样的演变，则可以估计这一演变的完成时间当不晚于 12 世纪，因为《番汉合时掌中珠》里的西夏字“瘡”既用来音译宕摄三等的“疮”（19.4；*tṣ'iañ）、“床”（23.5；*dz'iañ），也用来音译江摄的“窗”（23.2；*tṣ'oñ），这表明江摄的元音等同于宕摄三等的 *o*。

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总结出宕摄和江摄的以下演变模式：

宕摄 一等：*a > o

三等: (*a^①>) *ɔ>o

江摄 二等: *ɔ>o

由此途径演变来的读音,在山西的一些清代资料里仍有记载,并且在许多地方的口语中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乔全生 2008:194-196)。

四 山摄和咸摄元音的高化: 12世纪以后

山摄的鼻音韵尾 -n 和咸摄的鼻音韵尾 -m 在不空译音以及粟特文、藏文和回鹘文资料中保留完好,没有合并或脱落的迹象,但是在 12 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文献里发生了突变。变化后的一等韵和二三四等韵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类,其明显区别在于鼻音韵尾的保留和脱落。以下的对音例子除了来自《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外,也有几个来自西夏在 12 世纪下半叶翻译的汉文传统类书《类林》,见“汉夏对音索引”(王培培 2018:220-396)。

同一个西夏字可以对译山摄和咸摄阳声一等字,但是不能对译同韵摄的二三四等字或其他入声、阴声字:

𐵑 = 檀 (21.3; *d'an) 谭 (类林; *d'am)

𐵒 = 散 (类林; *san) 三 (32.3; *sam)

𐵓 = 肝 (18.6; *kan) 甘 (7.5; *kam)

𐵔 = 看 (30.3; *k'an) 堪 (28.3; *k'am)

这表明山咸摄阳声一等字仍然有鼻音韵尾,但是中古汉语的鼻音韵尾 -n 和 -m 已经合而为一了。参照现代晋语,不难确定这个新的韵尾是 -n。

同一个西夏字可以对译山摄和咸摄阳声二等字,但是不能对译同韵摄的一三四等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译山咸摄阳声字的同时还可以对译假摄二等字和脱落了塞音韵尾的入声字:

𐵕 = 限 (9.1; *yan) 馅 (33.4; *yam) 夏 (9.3; *ya) 匣 (24.2; *yap)

𐵖 = 产 (26.4; *san) 衫 (24.4; *sam) 沙 (23.2; *sa)

𐵗 = 间 (9.1; *kan) 监 (28.4; *kam) 家 (34.1; *ka)

𐵘 = 眼 (14.2; *han) 岩 (12.2; *ham) 鸭 (16.6; *hap)

𐵙 = 班 (类林; *pan) 巴 (类林; *pa) 八 (9.3; *pat)

假摄二等“夏”“沙”“家”“巴”诸字的读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 a,非常稳定,所以有理由推断由山咸摄二等和麻韵二等合并来的这个新韵类也是 a^②,其中阳声字的鼻音韵尾和入声字的塞音韵尾都已脱落,但是没有同时引起前面元音的改变^③。假摄二等字读 a 的情况不见于现代晋语和兰银官话,所以应该是这几个韵在脱落了鼻音韵尾之后的某个时间又发生了

^① 高本汉认为后元音 a 不能出现在三等介音后面,由此他为宕摄三等韵构拟了 ia。本文考虑到前元音 a 和后元音 a 在藏文和回鹘文中都不构成对立的音位,所以只写作 a,以求与宕摄一等的读音统一。

^② Matisoff (2004) 认为原始藏缅语的 *-a 在西夏语中会发生高化,演变成 -e 甚至前高元音 -i。因与本文的讨论关涉不大,此处不赘。

^③ 在鲜卑宝源所译的佛经咒语中,山咸摄阳声的鼻音韵尾还保留着,是因为当时的鼻音韵尾已经脱落,找不到合适的汉字来对译梵文带 -n、-m 的音节,只好沿用汉译佛经“顺古”的习惯,临时借用了前代的译法来充作“读书音”。

元音的高化，最终变成了汉语大同话、太原话、兰州话的 æ （高本汉 2003:589、600）。

西夏文献中反映的山咸摄三四等没有分别（Gong 1994）。同一个西夏字既可以对译山摄三四等阳声字和咸摄三四等阳声字，也可以对译假摄三等字和脱落了塞音韵尾的入声字，只是不能对译同韵摄的一二等字：

𦉑 = 线 (25.4; *sǐen)	先 (类林; *sien)	泄 (类林; *sǐet)
𦉒 = 言 (31.2; *ŋǐen)	验 (30.3; *ŋǐem)	业 (19.6; *ŋǐep)
𦉓 = 缠 (35.6; *dǐen)	祐 (24.6; *tǝʔem)	车 (27.1; *tǝʔia)
𦉔 = 衍 (类林; *ǐen)	琰 (类林; *ǐem)	也 (31.3; *ǐa)
𦉕 = 纤 (类林; *sǐem)	燮 (类林; *siep)	薛 (类林; *sǐet)

不难看出，这个韵类不带鼻音韵尾，应该是像大同话和太原话那样的 ie （高本汉 2003:590、600）。龚煌城（1989）认为山咸摄舒声的鼻音韵尾虽然已经消失，但引起了前面元音的鼻化。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鼻音韵尾固然可以引起前面元音的鼻化，但是纯元音韵母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变成鼻化元音，而要说“业”(*ŋǐep)、“薛”(*sǐet)等入声字的塞音韵尾也会引起元音的鼻化，则更是难以成立。

如果把高本汉构拟的主元音 * ɛ 、* ɐ 、* e 简化一下，统一为三等的 * $\text{ɛ}^{\text{①}}$ ，则可以总结出山咸摄的以下演变模式：

- 二等：* $\text{a} > \text{ɛ}$
- 三四等：* $\text{ɛ} > \text{e}$

五 音变的成因和历史趋势

表面上看，以上所谈西北方言的元音分层级高化很像英语史上的“元音大转移（the Great Vowel Shift）”，可是英语元音的高化主要与元音的长短有关，而汉语西北方言元音的高化却似乎与鼻音韵尾的存佚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学界认为西北方言宕摄的元音高化是脱落鼻音韵尾的即时补偿手段，而现在我们看到，鼻音韵尾的脱落并没有立即引起元音的改变，如 8 世纪的“莽”(* ma)、“囊”(* na) 虽然脱落了鼻音韵尾，但中古汉语的元音 a 仍然保持原样。同样，12 世纪山咸摄二等鼻音韵尾的脱落也没有立即引起元音的改变，仍然保持着中古汉语的 * a 。我们不知道 $\text{a} > \text{o} > \text{o}$ 和 $\text{a} > \text{ɛ}$ 这两个序列中每一步骤的具体发生时间，只知道这样的演变在一两个世纪之后才最终完成。梗摄的元音高化 (* $\text{a} > \text{ɛ} > \text{e} > \text{i}$) 比其他类型的元音高化完成得略早，但其具体过程也不清楚，就是说，现有文献还不能直接反映出梗摄二等在脱落了鼻音韵尾后经过了 a 这个过渡阶段。

文献记载最晚的音变是山咸两摄的阳声二三四等。相关韵类鼻音韵尾的脱落显得相当整齐且出现得相当突兀，不能从前代的资料中寻得先兆，这不得不使人怀疑是受到了西夏时代党项语语音特点的制约。就像现代彝语支语言那样，党项语所有的音节都是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只是党项语在西夏政权建立前就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龚煌城 1981），这些词有的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形式，有的则依党项语的音节结构作出了改变，这导致西夏韵书里出现了

^① 金理新（2013:6-7）认为，若对《切韵》音节分布以及无意义差别异读进行考察，可以对研究者们构拟的韵母进行删汰；否则，若把其中没有音位价值的韵误认为是音位上的区别，则以其为代表的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会十分庞杂。同样，研究者们构拟的复杂的中古汉语元音系统也可以根据音位原则进行归并。

少量带鼻音尾的韵类^①。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或可以说，位于低元音（一等）之后的 -n 比较容易保留，而位于较高元音（二三四等）后面的 -n 则脱落了。西夏政权（1038-1227）延续近二百年，统治着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到甘肃敦煌的广大地域，可以相信党项人君臣所说的汉语一定对当地方言产生过影响。由此看来，山咸摄的阳声一等在今太原话、大同话和河套话读作没有鼻音韵尾的 æ (<a<an)，或可视为这一规律在 13 世纪后若干年的延续。

在今晋语区和河西走廊沿线，本文讨论的阳声字在很多方言点都读作鼻化元音韵，如 ã 、 ã̃ 、 õ 等。比照以上总结的演变模式，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读法不是从唐宋西北方言直接发展而来的，因为按照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已经脱落了鼻韵尾的那些韵母不应该凭空再出现鼻化。同样在这片地区，本文讨论的阳声字也有些读作低元音韵，如 a 、 a 等。比照以上总结的演变模式，我们也倾向于认为这些读法不是从唐宋西北方言直接发展而来的，因为按照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已经高化了的元音韵母不应该凭空再变低。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鼻化元音和低元音的出现是外部因素导致的。

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把陕北至河西走廊一带封给了其第三子忙哥剌（？-1280），这片区域以今宁夏固原的六盘山麓为中心（这里也是元朝早期西北军事、政治的中心），称作“河西国”，一度是丝绸之路东段势力最大的地方政权，忙哥剌死后由其子阿难答（？-1307）继续执政。作为统治者的蒙古王公贵族里有不少人懂得汉语文，只是他们的口语是以元大都为中心的汉语方言，与西北方言差别很大，这已经有汉字音译本《元朝秘史》和八思巴字对音本《百家姓》作为证明。当时有难以数计的元朝政府文件用蒙古式汉语写成并发往全国（蔡美彪 2017），对各地的汉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推想，忙哥剌及当地政府驻军所讲的汉语也应是元白话一类，这种方言很快就成了“河西国”的通用语，从而引发了河西走廊原有方言成系统的变异，其主要变异之一就反映在原先脱落了鼻音韵尾的那些阳声韵上。

“河西国”没有政府公牍保存下来，今天能看到的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种《河西译语》（聂鸿音 2020），是北元宣光元年（1371）中书礼部编的“杂字体”字书，每个汉字字条下附有“河西语”的汉字音译。尽管这种语言的性质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用来译音的汉字代表的是元大都口音。如下面两个借词：

虎，拍浪革（波斯语 *palang*） 河西国，倘吾的（突厥语 *tang*）

这里出现了宕摄一等字“浪”“倘”，其韵母是 *ang*，而不是汉语西北方音的 *o*。尽管《河西译语》的 255 则词语中迄今能解读的很少，但据汉字注音可以大致还原每则词语的读音形式（沈钟伟 2020），其中频繁出现的鼻音韵尾字表明那时的河西汉语已经不是纯粹的唐宋西北方言了。由此可以推想，那片地区出现了河西方言与元白话的混合，甚至在某些地方被元白话借助政治影响覆盖了。

除了党项语之外，13-14 世纪河西走廊使用的语言都有鼻辅音尾，藏语、回鹘语、蒙古语乃至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都至少能表现中古汉语三个鼻音韵尾中的一个，因此重新掌握鼻音韵尾的发音对于当地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困难。

那么以本文论及的几个韵摄为基础，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认识，即 8 世纪见于文献记载的汉语西北方言沿着脱落鼻音韵尾 -ŋ 再把元音变高的途径发展，但是演变到 11 世纪中叶就

^① 基本保持原样的汉语借词多为臻摄（*-əŋ）和山咸摄一等（*-an）。西夏韵书《文海》专门设了几个韵来收录这些词。

出现了变化,那时有些韵在党项语的影响下进一步脱落了韵尾 $-n$ (来自更早期的 $-n$ 和 $-m$ 的合并),并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把相关的元音继续变高^①;13世纪中叶以后再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时的汉语西北方言在元白话的影响下系统地带上了鼻音韵尾,最终导致有的方言点表现为鼻音韵尾的清晰保留,有的方言点表现为舌位略高的鼻化元音 \tilde{a} 、 \tilde{e} 等,后者重新开始了几百年前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 [1] 蔡美彪. 2017. 《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高本汉. 2003. 《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印本),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3] 龚煌城. 1981. 《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2 本第 4 分.
- [4] 龚煌城. 1989. 《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言(韵尾问题)》, 载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与文字组)》(上册)第 145-190 页, 台北: 中研院.
- [5] 金理新. 2013. 《上古音略》, 合肥: 黄山书社.
- [6] 景永时、I. F. 波波娃. 2018. 《〈番汉合时掌中珠〉整理与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7] 刘广和. 1991.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 《河北大学学报》第 3 期.
- [8] 刘广和. 2002. 《音韵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9] 罗常培. 2012. 《唐五代西北方音》(重排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马伯乐. 2005. 《唐代长安方言考》, 聂鸿音译, 北京: 中华书局.
- [11] 聂鸿音. 1998. 《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 《民族语文》第 6 期.
- [12] 聂鸿音. 2006. 《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 《语言研究》第 2 期.
- [13] 聂鸿音. 2020. 《河西语: 14 世纪一种未知的语言》, 《语言研究》第 3 期.
- [14] 乔全生. 2008.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 [15] 沈钟伟. 2020. 《汉波斯音译与元代汉语口语》(上), 《辞书研究》第 2 期.
- [16] 孙伯君. 2010. 《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7] 孙伯君. 2016. 《12 世纪河西方音中的党项式汉语成分》, 《中国语文》第 1 期.
- [18] 王培培. 2018. 《夏译汉籍中的古代汉语对音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 [19] 张盛裕. 1993. 《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 《方言》第 4 期.
- [20] 朱晓农. 2004.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 《中国语文》第 5 期.
- [21] 朱晓农. 2005. 《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 《民族语文》第 1 期.
- [22] 高田时雄. 1988. 《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 东京: 创文社.
- [23] Gong, Hwang-chenng. 1994. A hypothesis of three grades and vowel length distinction in Tangu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6-47: 305-314.
- [24] Maspé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 1-119.
- [25] Matisoff, James A. 2004. "Brightening" and the place of Xixia (Tangut) in the Qiangic subgroups of Tibeto-Burman. In Ying-chin Lin et al. (eds.),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① 目前还不能断定其后一段时间的元音高化是否受到了前面 $-i$ 介音的影响。在 14 世纪前后用波斯文翻译的汉语著作中, 已经有迹象表明二等开口字开始出现 $-i$ 介音了(转写作 i) (沈钟伟 2020)。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pp. 327-35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26] Müller, F. W. K. 1907. Die “persischen” Kalenderausdrücke im chinesischen Tripitaka.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tzung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16: 458-465.

Historical Layers of Vowel Raising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s Reflected from Transcriptional Representations

HU Hongyan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at vowel raising related to the loss of nasal endings has occurred three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s reflected from the transcrip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in other languages. The reflexes of the *Yangsheng* 阳声 rhymes in various varieties of modern *Jinyu*, i.e., modern Jin dialects, and Lan-Yin mandarin constitute three types: nasal endings, nasalized vowels and vowel endings, with variations in the heights of the corresponding vowels. This complex situation results from the superimpositi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layers, instead of a direct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 per se.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is regard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can be subsumed into three layers. The first layer lasts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featuring a loss of the nasal ending -ŋ and vowel raising, i.e., $a > \varepsilon > e > i$ and $\alpha > \circ > o$. The second layer lasts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featuring a loss of the nasal ending -n and vowel raising, that is, $a > \varepsilon > e$. The third layer occurs after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featuring regained nasal endings under foreign influence, and in its wake occurs again the vowel raising process in some localities of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Vowel raising may be triggered by the loss of nasal endings, but the two kinds of phenomena are asynchronous.

[Keywords] transcription *Jinyu* Lan-Yin mandarin nasal ending vowel raising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李云兵】